

台湾经济嵌入大陆的省域差异： 基于多维嵌入框架的测度分析

李 非 任之煌

【内容提要】 两岸经济融合并非均质化推进的总体过程，而是在大陆不同省域中展开的差异化嵌入与地方根植过程。本研究基于嵌入性理论，将台湾经济在大陆的融合转化为省域尺度上的多维嵌入问题，构建经贸嵌入、生产嵌入与社会嵌入相结合的分析框架，并运用组合赋权方法，对 2004—2023 年台湾经济嵌入大陆省域的水平、结构与时空演化特征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台湾经济嵌入大陆总体呈现阶段性波动特征，经历了快速提升、波动调整与恢复回升的演变过程，反映出两岸经济联系在外部环境变化下的调整延续性。从空间格局看，高嵌入区长期集中于江苏、上海、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省域，并呈现由近岸门户和沿海产业走廊向内陆节点扩散的梯度特征；中西部部分省域则在产业转移、市场扩张和政策支持下逐步成为新的承接空间。从嵌入结构看，经贸嵌入体现台湾经济进入大陆地方市场的通道属性，生产嵌入反映台资企业与地方产业体系的组织耦合，社会嵌入则构成其长期根植的重要关系基础。进一步划分区域类型发现，不同省域的嵌入差异并不单纯取决于投资规模，而是由产业基础、开放条件、制度供给和社会联系共同塑造。本研究从省域尺度揭示台湾经济嵌入大陆的空间分异与地方机制，为理解两岸经济融合的区域差异及其政策推进路径提供经济现实依据。

【关键词】 台湾经济；多维嵌入；两岸融合；省域差异；组合赋权法

【作者简介】 李非，国家 2011 计划——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经济平台主任、福建农林大学台湾研究院首席专家；任之煌，本文通讯作者，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683 (2026) 03-0117-22

DOI:10.13818/j.cnki.twyj.2026.03.008

· 117 ·

引言

两岸经济关系的深层变化，并不只发生在两岸总体贸易额、投资额和台资企业数量的增减之中，更发生在台湾经济与大陆地方经济体系之间持续重组的空间关系之内。长期以来，台商投资、产业转移、供应链协作和社会联系共同推动台湾经济融入大陆市场，并在不同地区形成差异化的地方根植形态。^① 由此看来，两岸经济融合并非一个均质化、线性化的总体过程，而是一个在大陆内部不同省域中展开的、多维度嵌入与再嵌入的过程。

近年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组，区域经济合作规则不断调整，国际经贸环境不确定性上升，两岸关系也经历多重波动。^② 在此背景下，两岸经贸联系并未简单断裂，而是呈现出结构调整、区域重组和功能再分化的复杂特征。部分沿海省域仍保持较强的台资集聚能力和产业协同基础，部分中西部地区则在产业梯度转移、地方政策支持和市场扩张中逐渐成为新的承接空间。这说明，两岸经济融合的核心已经不能仅从宏观总量层面加以理解，而必须深入大陆内部的地方空间，考察台湾经济在不同省域中的进入深度、组织方式和根植机制。

既有研究对两岸经济关系的演进提供了重要解释。^③ 研究关注两岸贸易、投资与产业分工的阶段性变化，揭示了两岸经济联系由要素流动向产业协作延伸的过程；^④ 其他研究尝试构建经济融合指标体系，从贸易依赖、投资规模、产业关联等方面评价两岸经济融合水平；还有研究从制度安排、政策环境、市场互补、文化联系和社会网络等角度讨论两岸经济合作的影响因素。这些成果为理解两岸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也留下了一个尚未充分展

① 石正方：《两岸经济融合发展：概念界说与路径选择》，《台湾研究集刊》2020年第3期，第41-49页。

② 苏美祥：《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内涵、难点与推进策略思考》，《台湾研究集刊》2020年第4期，第101-110页。

③ 汪曙申：《全面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主要意涵与创新路径》，《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年第3期，第112-122页。

④ 王华：《新发展格局下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动力建构》，《台湾研究》2021年第2期，第9-16页。

开的理论空间：当大陆并不是一个同质化市场，而是一个复杂区域系统时，台湾经济在大陆的融合过程必然具有明显的省域差异。若仅以两岸总体贸易额或投资额衡量融合程度，就容易遮蔽这种内部差异，也难以解释台资企业在不同地方为何表现出不同的存续能力、产业耦合程度和社会根植水平。

因此，本研究试图将“两岸经济融合”这一宏观命题重新转化为“台湾经济在大陆省域中的嵌入差异”这一可测度、可比较、可解释的经验问题。与传统经济联系研究相比，嵌入性视角的优势在于，它并不把经济行为理解为抽象市场中的孤立选择，而是强调资本流动、企业经营和产业协作始终发生在具体地方情境之中。对于台资企业而言，进入大陆某一省域并不意味着已经实现深度融合。只有当其与地方市场形成稳定交换关系，与地方产业体系形成协作分工，与地方制度环境形成适应性互动，并通过社会联系获得持续信任和关系支撑时，台湾经济才可能从“空间进入”转化为“地方根植”。由此，嵌入性不仅能够解释台湾经济“在哪里集聚”，更能够解释其“为何能够在某些地方持续扎根”。

基于此，本研究以 2004—2023 年为研究时段，将大陆省域作为基本分析单元，构建经贸嵌入、生产嵌入和社会嵌入相结合的多维评价指标体系，综合利用台资企业注册信息、投资数据、贸易数据和社会联系数据，测度台湾经济在大陆不同省域中的嵌入水平。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分析其时间演变、空间格局和区域类型，试图揭示台湾经济在大陆地方经济体系中的差异化嵌入路径。本研究重点回答三个问题：第一，2004—2023 年台湾经济嵌入大陆省域的总体水平经历了怎样的阶段性变化？第二，不同省域在嵌入水平和嵌入结构上呈现出何种空间分异，并可划分为何种区域类型？第三，经贸嵌入、生产嵌入与社会嵌入在不同类型省域中呈现出怎样的组合差异，其背后反映出何种地方性嵌入路径？

一、视角转换、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两岸经济不对称格局与研究视角转换

长期以来，两岸贸易、投资和产业协作联系紧密，但这种高密度联系并

未形成对称性的经济互动格局。相反，由于市场规模、产业分工、制度开放顺序与资本准入条件的差异，两岸经贸关系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呈现出“联系密切”与“结构不对称”并存的特征。由此，两岸经贸往来并非均衡的双向资本流动，而是一种具有明显方向差异和结构落差的经贸互动模式。

这种结构性不对称首先体现在两岸双向投资规模的长期差距上。根据台湾地区经济事务主管部门统计月报数据，将 1991—2023 年台商赴大陆投资金额与 2009—2023 年陆资赴台湾投资金额进行汇总（图 1）。如图 1 所示，两岸之间的经济关系长期以来存在显著的不平衡性，两岸投资呈现出显著的不对称特征，台商赴大陆的投资金额远高于大陆对台湾的投资。台商赴大陆的投资金额在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持续增长，尤其在 2010 年达到高峰，年均投资金额维持在数十亿美元级别，而大陆对台湾的投资则长期处于低位，年均金额普遍低于 1 亿美元，且波动幅度较小，投资规模差异尤为明显，如 2009 年，台商赴大陆投资金额为 71.43 亿美元，而大陆赴台投资仅为 375 万美元，二者规模天差地别。同时在出口方面，台湾对大陆出口额远高于大陆对台出口，台湾对大陆享有巨大的贸易顺差。按照大陆海关统计，2025 年台湾对大陆出口 2307 亿美元、进口 836 亿美元，贸易顺差 1471 亿美元。同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 1744 亿美元，其中对台湾投资 21 亿美元，占总投资的比例仅为 1.2%；而台湾对外投资金额为 399 亿美元，对大陆投资 15 亿美元，断崖式下滑，占总投资的比例降为 3.8%。这种不平衡性反映了两岸经济贸易活动的不对称性格局。

在产业合作方面，从出口货品类别看，台湾对大陆出口最大宗为“电子零组件”，以 2023 年为例，全年出口额达 969.94 亿美元，占总额的 63.7%，其次是“资通与视听产品”148.57 亿美元。而大陆的多元化市场则为台湾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使得台湾电子信息及半导体产业链与大陆市场和供应链体系保持较强关联。

由此可见，两岸经济联系虽然具有双向互动属性，但在现实运行中并非均衡对称展开，而是更多表现为台湾资本、台资企业及相关产业联系向大陆市场和地方经济体系的持续进入。基于这一现实格局及数据可得性，本研究不再笼统测度抽象意义上的双向经济融合，而是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台湾经济

在大陆省域中的嵌入过程，重点考察台湾资本、台资企业及相关社会联系在不同省域中的进入程度、结构差异和时空演化特征，以揭示当前两岸经济联系在大陆内部的空间分异与地方化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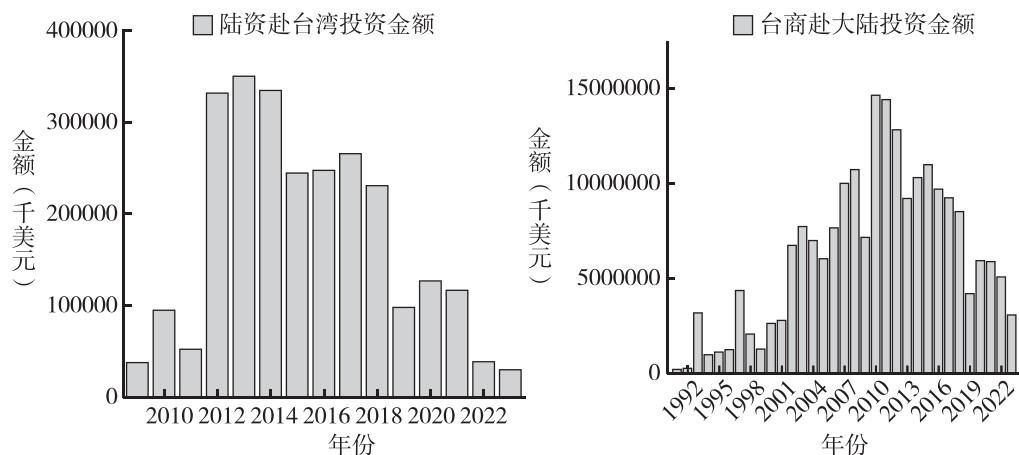


图 1 两岸相互投资金额统计图

(二) 理论框架

嵌入性理论关注经济活动如何在具体的社会与地方情境中展开。企业的投资选择、生产组织和持续经营，并不只是由价格、成本和市场规模决定，还受地方产业基础、制度环境、社会关系和空间条件的共同影响。外来资本进入某一地区只是经济联系形成的起点，只有当企业与当地市场、产业体系和社会环境形成较为稳定的互动关系时，资本流动才可能转化为具有持续性的地方根植。^①

这一视角适用于解释台湾经济在大陆省域中的差异化布局。台湾资本和台资企业进入大陆后，并不是在同质化市场中均匀扩散，而是嵌入到具有不同产业基础、开放条件、制度环境和社会联系的地方经济体系之中。因此，台湾经济在各省域中的表现差异，不能仅由投资规模或企业数量解释，还需要考察其与地方市场、产业体系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连接程度。嵌入性理论正

^① 任之煌、韦素琼、游小珺等：《关系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两岸经济融合研究评述》，《亚热带资源与环境学报》2024 年第 3 期，第 102-110 页。

好为这种由“空间进入”到“地方根植”的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撑。

基于嵌入性视角，本研究将台湾经济在大陆省域中的嵌入划分为经贸嵌入、生产嵌入和社会嵌入三个维度。经贸嵌入主要反映投资、贸易和企业进入地方市场的强度，是台湾经济进入大陆省域的基础表现；生产嵌入关注台资企业通过产业链协作、生产网络配置和劳动力市场参与融入地方经济体系的程度，体现台湾经济与大陆地方产业分工之间的组织联系；社会嵌入则强调文化临近、婚姻联系和政策互动等社会基础对经济关系稳定性的支撑。三类嵌入共同构成台湾经济在大陆省域中由“进入”走向“根植”的过程，也为后文构建指标体系和分析空间分异提供理论依据。

1. 经贸嵌入

经贸嵌入强调台资企业与大陆各省域之间的经贸联系，通过投资和贸易活动，台资企业逐渐融入大陆经济当中。随着本地经济活动和市场环境对台资企业影响的不断提升，两者之间的经济联系也愈发紧密。^① 投资嵌入从宏观层面看，台湾在各省域投资项目的数量反映了台湾经济在当地的嵌入广度，项目数量的增加表明台资企业在该省域开展了更多业务，覆盖了更多的行业及领域，体现了经济活动的分布广泛性。而投资规模则反映了嵌入的深度，通常以投资金额来衡量地区的投资规模，投资金额较大，意味着该省域的台资经济活动相对活跃，大量资金的流入，对当地经济产生较大影响。在微观层面上，在营台企数量反映了台资企业在大陆市场的生存状况，数量的高低也刻画出嵌入程度的高低；贸易嵌入主要衡量台湾与大陆各省域之间的贸易活动，反映两地经济往来的密切程度，贸易强度的大小反映了台湾经济对某一省域整体经济的贡献程度，而贸易依赖度则指某省域对台湾地区贸易的依赖程度，反映了台湾经济在该省域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力。

2. 生产嵌入

生产嵌入指台资企业将生产网络嵌入到大陆经济体系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又分为产业嵌入和劳动嵌入两个层面。生产嵌入不仅关注生产的规模、效率和收益，还强调跨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通过生产嵌入，企业能够加速融

^① 王华、李嘉欣：《全球价值链重构下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向——针对两个典型事件的综合效应评估分析》，《台湾研究集刊》2023年第3期，第46-65页。

入地方市场,从而提升生产效率和竞争力。产业嵌入指外资企业在当地产业的融入程度。本研究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一是通过“规模以上台资工业企业资本金”来衡量台资企业的资本投入与发展规模;二是通过“投资额度变动率与地区 GDP 变动率之比”评估台资企业的投资效益与经济增长的关联;三是通过“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来反映台资企业的盈利水平及其对地区经济的贡献。根据劳动力市场理论,高工资能够吸引更多技能熟练的工人集聚,从而促进劳动力市场的优化配置,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进一步促进生产升级。^① 这种高质量的劳动力嵌入有助于增强台资企业在大陆市场的竞争力,提升企业根植性,因而用台商投资单位平均工资来衡量雇佣水平,从而反映劳动嵌入。

3. 社会嵌入

社会嵌入强调台资企业和台湾居民在大陆社会中的互动和融合,指台资企业和台湾居民通过文化、社会关系和政策支持等方面嵌入当地社会环境,而文化相似性和文化认同也能够增强人们之间的信任感和合作意愿。^② 在经济活动中,文化认同有助于减少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带来的交易成本,提高沟通效率,增强企业间的合作和协同效应。在两岸经济互动中,地理邻近不仅意味着空间距离较短,也意味着人员往来、信息交流、商务沟通和社会关系维系的成本相对较低,是台湾经济主体进入大陆地方社会的重要基础条件。基于此,本研究以大陆各省会城市或直辖市政府驻地至台北市的球面距离表征其地理邻近性;婚姻嵌入不仅体现了两地居民之间的亲缘关系和社会融合,更通过增强信任、促进人才流动、扩大市场和商业机会等途径,对经济嵌入产生深远影响。通过婚姻嵌入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台资企业在大陆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促进了台湾经济更深层次地嵌入大陆经济体系中;与政府互动中的惠台政策颁布和台商投资区建立,体现了政商关系、公共服务与支持关系以及双向交流合作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在

^① 孙敬水、丁宁:《企业异质性、劳动力异质性与技能工资差距》,《商业经济与管理》2019 年第 8 期,第 41-57 页。

^② 韦永贵、张艺川:《跨国文化传播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基于友好城市的研究视角》,《南方经济》2021 年第 11 期,第 97-121 页。

社会嵌入中通过制度化保障、增强社会信任和社区融入等方式得到体现，最终对经济嵌入产生深远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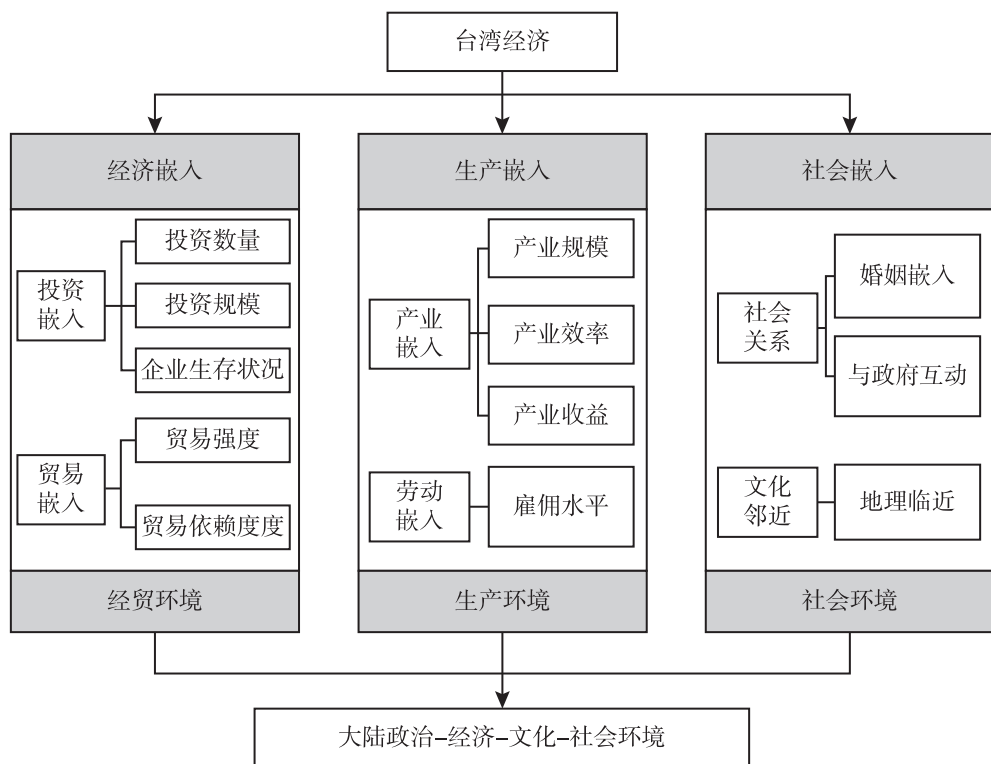


图2 台湾经济嵌入大陆省域的多维分析框架图

（三）研究方法

1. 台湾经济嵌入大陆省域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研究从“经贸嵌入”“生产嵌入”和“社会嵌入”三个维度出发，选取6个一级指标和12个二级指标，构建了台湾经济嵌入大陆省域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

2. 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研究结合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采用组合权重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层次分析法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的局限，同时也综合了熵权法客观赋权的优点，使得最终确定指标权重更加符合实际。在层次分析法赋权过程中，本研究邀请5名两岸经济、区域经济及统计评价等领域的专家进行指标重要性

判断，采用 1—9 标度法构建判断矩阵，并运用几何平均法汇总专家意见。经检验，各层级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比率（CR）均小于 0.10，表明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所得权重具有较好的可靠性。使用乘数合成归一法将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得到的权重结果进行耦合，得到一个组合权重。乘数合成归一法计算公式为：

表 1 台湾经济嵌入大陆省域的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台湾经济嵌入大陆省域程度	经贸嵌入	投资嵌入	投资数量	台湾在省域投资项目数量（个）
			投资规模	台湾在省域的投资占台湾在大陆的总投资（%）
			企业生存状况	省域在营台资企业数量（个）
		贸易嵌入	贸易强度	省域与台湾的贸易总额/地区 GDP（%）
			贸易依赖度	省域与台湾的贸易总额/省域国际贸易总额（%）
	生产嵌入	产业嵌入	产业规模	规模以上台资工业企业资本金（元）
			产业效率	投资额度变动率/地区 GDP 变动率（%）
			产业收益	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亿元）
		劳动嵌入	雇佣水平	台商投资单位平均工资（元）
	社会嵌入	文化邻近	地理临近	各省会城市或直辖市政府驻地至台北市的球面距离（km）
		社会关系	婚姻嵌入	大陆台湾居民登记结婚数量（对）
			与政府互动	施行惠台政策，建立台商投资区数量（个）

$$W_i = \frac{W'_i \cdot W''_i}{\sum_{i=1}^n W'_i \cdot W''_i}$$

(1)

式中： W_i 指的是组合权重； W'_i 指的是层次分析法所得权重； W''_i 指的是熵权法所得权重； n 表示指标个数。

3. 台湾经济嵌入大陆省域程度评价模型

本研究采用评价指标加权分值综合评价法，自下而上逐级计算各指标，得出嵌入程度评价得分，并在此基础上对台湾经济嵌入大陆省域程度进行综合测算。嵌入程度综合评价模型为：

$$F = \sum W_i \times B_i$$

式中： F 表示嵌入程度的综合评价分值； W_i 表示第 i 项指标的权重； B_i 表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

表 2 台湾经济嵌入大陆省域的指数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准则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权重			
			AHP 法	熵权法	局部权重	全局权重
经贸嵌入 (0.420)	投资嵌入 (0.250)	投资数量	0.277	0.371	0.324	0.081
		投资规模	0.292	0.274	0.283	0.071
		企业生存状况	0.431	0.355	0.393	0.098
	贸易嵌入 (0.170)	贸易强度	0.623	0.565	0.594	0.101
		贸易依赖度	0.377	0.435	0.406	0.069
生产嵌入 (0.330)	产业嵌入 (0.230)	产业规模	0.552	0.433	0.492	0.113
		产业效率	0.287	0.374	0.331	0.076
		产业收益	0.161	0.193	0.177	0.041
	劳动嵌入 (0.100)	雇佣水平	1	1	1	0.100
社会嵌入 (0.250)	文化邻近 (0.090)	地理临近	1	1	1	0.090
	社会关系 (0.160)	婚姻嵌入	0.534	0.622	0.578	0.092
		与政府互动	0.466	0.378	0.422	0.068

(四) 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和部分省域台资企业稀少，本研究的研究区域选定为除去台湾、香港、澳门、西藏、青海、宁夏后的 28 个中国省级行政区，将研究的时间范围设定为 2004—2023 年。本研究用到的企业数据来源于企查查及天眼查等官方备案企业征信机构，获得了台商投资企业的基本信息。台商赴大陆投资金额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统计月报数据，由于月报中关于新疆、青海、宁夏、甘肃、陕西五省的投资金额统一记录为西北区域总额，未单独记录，因此本研究将该省台资企业数量占五省总体的台企数量的比值与台商赴西北区域投资总额之积来代表台商在该省的投资额。其余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海关统计数据和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二、台湾经济嵌入大陆省域的时空演化与结构分异

（一）总体嵌入水平的时间演变

将台湾经济嵌入指数按年度加总后可以发现，2004—2023 年台湾经济嵌入大陆省域的总体水平并非线性上升，而是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波动特征。结合图 3 的变化趋势，可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04—2010 年的快速提升阶段，嵌入指数总体上升，并在 2010 年前后达到峰值；第二阶段为 2011—2018 年的高位回落与波动调整阶段，嵌入指数较峰值有所下降，但总体仍维持在相对较高水平；第三阶段为 2019—2023 年的低位冲击与恢复性回升阶段，2019 年嵌入指数降至阶段性低点，随后呈现低位波动并在 2023 年明显回升。通过分析台资企业数据及台湾地区经济事务主管部门的相关资料可以发现，在 1990—2004 年间，台资企业数量、台商投资项目数量及投资金额均实现了大幅增长，充分反映出这一时期台湾经济嵌入大陆省域的程度显著提升，为后续嵌入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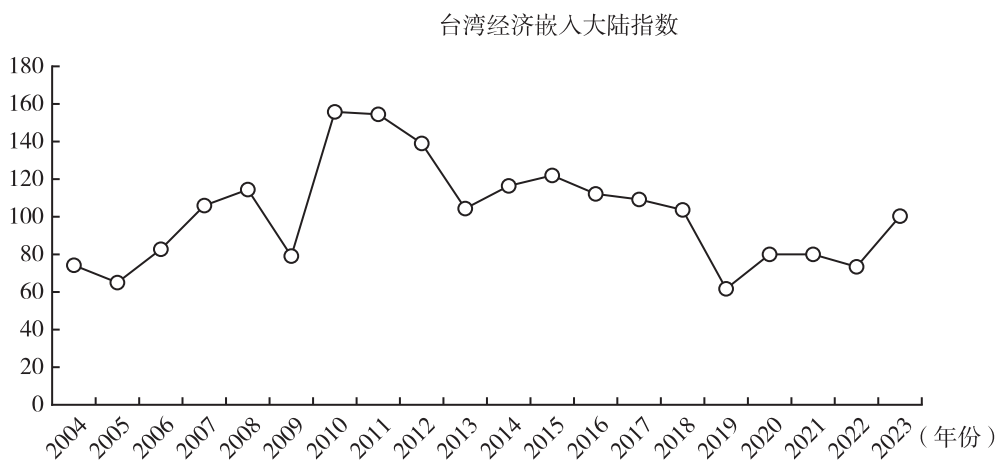


图 3 2004—2023 年台湾经济嵌入大陆指数的时间演变图

（二）省域嵌入水平的类型划分

根据台湾经济嵌入指数的测算结果，本研究采用自然断点法将各省域划分为四种类型（表 3）。该方法依据指数数值的内部差异确定分组边界，能够

较好识别省域间嵌入水平的梯度分异。结合指数高低依次将其命名为全面协同区、持续深化区、新兴增长区和潜力拓展区。

第一，全面协同区对应嵌入指数最高等级，是台湾经济嵌入大陆省域最深的区域。该类省域通常具有较高的台资企业集聚水平、较强的贸易和投资联系、较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以及较稳定的社会和制度联系，台湾经济主体不仅实现了市场进入，而且与地方产业体系形成了较深的组织耦合。

第二，持续深化区对应嵌入指数次高等级，其台资基础和产业承接能力相对较强，但整体嵌入水平仍低于全面协同区。该类区域通常处于台资布局持续扩展和产业合作深化阶段，表现为投资、贸易或生产嵌入中的部分维度较为突出，但三维嵌入的协同性仍有提升空间。

第三，新兴增长区对应中等嵌入等级，是台湾经济由沿海核心区向内陆或外围节点扩散的重要承接区域。该类省域的综合嵌入水平尚未达到高值区，但台资进入和产业合作呈现增长趋势，具有进一步提升嵌入水平的可能。

第四，潜力拓展区对应嵌入指数较低等级，台湾经济在地方经济体系中的嵌入仍处于初步拓展阶段。但这类区域并不意味着缺乏合作基础，部分省域可依托资源禀赋及成本优势，探索差异化的对台合作路径。

表 3 2004—2023 年台湾经济嵌入大陆省域的类型变化

类型	2004—2008 年	2009—2013 年	2014—2018 年	2019—2023 年
全面协同区	江苏、上海、福建、广东（4）	江苏、上海（2）	福建、上海（2）	江苏、上海、广东、福建（4）
持续深化区	浙江、天津（2）	福建、广东（2）	江苏、广东（2）	浙江（1）
新兴增长区	重庆、山东、江西、北京、湖北、山西、广西、四川、辽宁、湖南、安徽、河北（12）	浙江、天津、重庆、四川、山东、辽宁、江西、北京、山西、湖北、安徽（11）	浙江、北京、四川、山东、河南、安徽、天津、湖北、湖南、重庆、辽宁、江西（12）	天津、重庆、山东、江西、北京、湖北、四川、辽宁、湖南、广西、山西、安徽（12）
潜力拓展区	海南、河南、陕西、云南、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贵州、新疆（10）	贵州、广西、河南、湖南、陕西、河北、云南、吉林、海南、新疆、黑龙江、内蒙古、甘肃（13）	广西、贵州、吉林、海南、云南、河北、陕西、黑龙江、山西、新疆、甘肃、内蒙古（12）	海南、河北、河南、陕西、吉林、黑龙江、云南、贵州、甘肃、内蒙古、新疆（11）

注：括号内数字为该类型包含的省域数量

（三）省域嵌入格局的空间分异

纵观 2004—2023 年，嵌入程度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整体呈现出沿“博台线”^①递减的趋势，这一地理分布格局更加凸显了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嵌入高值区主要集中于东部经济发达省域，尤其是江苏、上海、福建、广东等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东部沿海省份；而嵌入低值区则多分布于西北、西南、东北等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经济欠发达的省域。

分阶段看，2004—2008 年台湾经济嵌入大陆省域的总体水平仍处于由低位向中高位提升的阶段，但空间集聚格局已经较为清晰。东部沿海地区依托较早形成的开放平台、产业配套和对台经贸联系，率先成为台湾经济嵌入大陆的核心承接区域；相比之下，中部地区受产业配套、交通区位和开放平台等条件制约，嵌入水平相对有限，西部地区由于市场可达性和产业基础不足，台资进入和台企发展整体不够活跃。2009—2013 年和 2014—2018 年，总体嵌入水平有所回落并进入调整阶段，东部核心区的相对优势仍然保持，但部分中西部省域在产业转移和区域开发政策推动下开始承接台资布局。2019—2023 年，嵌入水平在经历低点后呈现恢复性回升。从空间格局看，江苏、上海、福建、广东仍构成高嵌入区域的主体，同时河北、天津等省域的类型位置发生变化，说明台湾经济嵌入大陆省域的格局并非静态固化，而是在总体波动中发生结构性调整。

（四）不同类型区的嵌入特征与形成机制

全面协同区经济开放程度高，产业配套完善，是台商向大陆投资的核心区域，具体包括江苏、上海、福建、广东等地。不同地区在各类产业上各有侧重，具体而言，江苏省以苏州为核心，依托城市群联动效应，形成以电子信息和精密制造为主的台商投资集群。福建省以厦门为代表，在光电产业和食品加工领域表现突出。上海市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吸引了金融、科技服务及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大量台资企业集聚。广东省以深圳为核心，构建了全球领先的电子信息和智能制造产业集群。总之，全面协同区基于良好的区域资源，与台资企业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基础，近年来又逐步向科技研发、智能制

^① “博台线”是指连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与台湾省台北市的轴线，呈西北—东南走向，垂直于胡焕庸线。

造等高科技、高附加值领域迈进。

持续深化区覆盖浙江、天津等地。这些区域均处于产业转型的关键阶段，凭借较好的工业基础，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发展潜力巨大，持续吸引台资布局。浙江省以杭州为核心城市，重点发展数字经济驱动的互联网服务、现代服务业及高端制造业。天津市以新能源、航天和现代物流为重点，依托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提升对台资企业的吸引力。持续深化区一般受到全面协同区溢出效应的影响，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台资产业集群。

新兴增长区包括重庆、河南、山东、四川等发展强劲的中西部地区。这些区域是台商投资快速增长的区域，表现出强劲的市场潜力，尤其在全球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中部地区的地方政府通过各项优惠政策积极承接来自东部沿海的产业转移和配套环节外溢，在此过程中，台资企业加速布局。其中重庆市聚焦于电子信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探索，形成以智能终端和汽车零部件为核心的台资产业集群。河南凭借富余劳动力，吸引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电子、家具、服装等制造业，发展潜力较大。

潜力拓展区是台商投资的初步开拓区域，位于大陆发展较为薄弱但潜力巨大的西部地区，主要包括贵州、云南等地。这些地区具有较强的成本优势，资源禀赋较为突出。台资产业在这些区域主要进行农产品加工，或跟随全球产业转移的浪潮将较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迁移至潜力拓展区进行进一步发展。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配套设施不足以及台湾母公司距离较远等原因的影响，潜力拓展区的发展规模较小，但随着区域发展战略的推进，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未来可吸引更多台资进入。

总体来看，各区域台资投资分化明显。全面协同区和持续深化区主要位于大陆东部沿海地区，是过往台商投资的主要阵地，投资产业主要围绕高新技术等高附加值产业；新兴增长区主要位于大陆中部地区，凭借强劲的市场潜力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通过制造业转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成为目前台商投资新的增长极；潜力拓展区主要位于西部地区，生产成本比较优势明显，资源禀赋突出，发展潜力巨大。

（五）三维嵌入的省域分化：从近岸登陆到多节点根植

将台湾经济嵌入大陆省域的过程放入台商投资大陆的历史脉络中看，其空

间格局经历了由近岸登陆、沿海集聚到多节点扩散的渐进过程。早期台商进入大陆，首先依托地缘邻近、语言文化相通和亲缘社会网络，在闽粤沿海形成登陆式布局；随后，伴随大陆开放型经济体系和制造业集群的成长，台资进一步向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产业高地集聚；进入调整深化阶段后，台商投资开始从单纯成本导向和加工贸易导向，逐步转向产业链协同、内需市场拓展和区域节点布局，部分中西部、环渤海和内陆中心城市由此进入台资扩散网络。

1. 经贸嵌入：沿海地区率先集聚并逐步扩散

经贸嵌入最明显的特征是沿海锁定，首先受到地理距离、开放程度和市场可达性的影响，早期更多表现为近岸进入和沿海集中。闽粤沿海之所以成为台商投资大陆的重要起点，并不只是因为地理距离近，更因为这些地区较早具备口岸开放、侨台关系、加工贸易和地方招商条件。随着大陆沿海经济带的成型，台资经贸联系逐渐从单个登陆点扩展为沿海市场走廊，长三角和珠三角成为承接台资最稳定的两大空间。

这一维度的省域特征，可以概括为“门户性”和“通道性”。福建的经贸嵌入带有鲜明的对台专属性，体现的是地缘、文化和政策平台叠加形成的吸附能力；长三角更多体现市场容量、制度环境和综合服务能力；珠三角则依托外向型制造和全球贸易网络维持台资联系。相比之下，内陆省域的经贸嵌入更多表现为阶段性承接，而不是稳定的初始吸附。也就是说，经贸嵌入并不均匀扩散，而是优先流向那些能够降低进入成本、提供开放平台并连接外部市场的地区。

因此，经贸嵌入主要反映台湾资本和台资企业进入大陆地方市场的规模及其空间分布。投资和贸易联系形成较快，但也容易受到成本变化、政策调整和产业链重组等因素影响。较高的经贸嵌入水平说明一个地区对台资具有较强吸引力，但并不意味着台资企业已经与当地产业和社会形成稳定联系。

2. 生产嵌入：由沿海产业集聚向内陆节点延伸

生产嵌入主要反映台资企业与当地产业体系之间的联系程度。台商投资大陆早期具有较强的加工制造和成本导向特征，主要依托劳动力成本、出口通道和加工贸易体系实现生产转移。随着大陆产业链体系不断完善、内需市场持续扩大以及台企经营模式调整，台资企业逐渐由简单生产环节嵌入，转

向供应链协作、研发服务、内销拓展和产业升级等更深层次的组织嵌入。相应地，大陆台企也由“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逐步转向内外销并重；投资结构则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演进，并由制造业进一步延伸至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

不同省域的生产嵌入水平，主要取决于当地产业基础和配套能力。长三角制造业体系较为完整，专业化分工和供应链配套较为成熟，台资企业能够较顺畅地嵌入本地产业网络；珠三角则依托外向型制造、电子信息产业和灵活的企业网络，使台企能够较好地连接国际订单、本地配套和国内市场。福建则将对台政策平台、产业园区和地方配套结合起来，为台资企业进入、留存和扩大投资提供支持。

与经贸嵌入相比，生产嵌入形成较慢，但稳定性更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政策优惠在短期内吸引投资项目，却未必能够由此形成持续性的生产嵌入；只有当台企与本地供应商、劳动力市场、产业园区和专业服务体系建立稳定联系后，才可能由“项目落地”转向“组织根植”。因此，部分中西部节点虽然已开始承接台资转移，但其真正挑战并不在于单纯引进企业，而在于能否培育产业链协同、配套供给和再投资机制。

总体而言，生产嵌入呈现出两种主要形态：沿海核心区表现为成熟产业网络中的深度嵌入，重在供应链黏性、功能升级和产业协同；内陆节点则表现为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成长型嵌入，重在承接能力、配套培育和组织留存。前者体现台资企业在成熟产业体系中的深层根植，后者则体现台资空间布局由沿海集聚向内陆节点延伸的阶段性趋势。

3. 社会嵌入：不同地区形成差异化联系

社会嵌入呈现出不同于经贸嵌入和生产嵌入的空间逻辑。社会嵌入并不完全受经济总量、产业基础或台资规模支配，而更多取决于文化亲近性、人口流动、婚姻关系以及地方政府制度化互动。因此，社会嵌入能够解释两类现象：一是部分地区虽非台资集聚高地，却拥有较强的社会关系基础；二是一些经济发达省域虽在经贸和生产层面嵌入较深，但社会根植并未同步深化。

福建是社会嵌入最具代表性的省域，其优势并非单纯来源于投资规模，

而是建立在闽台之间长期积累的地缘、血缘、文缘与商缘联系之上，并通过惠台政策、台商投资区和融合发展平台不断实现制度化转化。国务院支持福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和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相关政策中，明确提出推进全域对台开放、台商投资区扩区、新设台商投资区以及支持涉台经贸文化交流，表明福建的社会嵌入已由传统文化联结进一步转向政策平台和制度安排支撑下的深层根植。

广东则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嵌入路径。相较于福建的文化同源型嵌入，广东更多体现为开放流动型嵌入。依托长期开放环境、港澳台社会网络、人口流动规模和城市就业机会，广东形成了市场化、网络化和流动性较强的社会联系基础。长三角地区的社会嵌入又具有城市功能型特征，更多依赖就业机会、公共服务、营商环境和制度化服务能力，而非传统亲缘文化。

因此，社会嵌入揭示的并非台湾经济主体“在哪里投资最多”，而是其“在哪里更容易形成长期关系、制度信任和稳定预期”。这不是经贸嵌入的附属结果，而具有相对独立的空间逻辑。只有当文化基础、生活联系与政府互动相互支撑时，台湾经济在地方社会中的根植性才会真正增强。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研究基于嵌入性理论，将台湾经济进入大陆的过程置于省域地方经济体系中加以考察，构建经贸嵌入、生产嵌入和社会嵌入三维分析框架，对 2004—2023 年台湾经济嵌入大陆省域的时空演化与区域差异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台湾经济嵌入大陆并非均质化推进的过程，而是在不同产业基础、开放条件、制度供给和社会联系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差异化地方根植过程。

第一，从时间演变看，2004—2023 年台湾经济嵌入大陆省域的总体水平呈现阶段性波动特征。2004—2010 年，受台资企业加速进入、大陆沿海开放平台完善和制造业配套能力提升等因素推动，嵌入水平快速上升；2011—2018 年，受成本上升、产业链调整和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嵌入水平进入高位回落与波动调整阶段；2019—2023 年，嵌入水平经历阶段性低点后逐步恢

复。总体而言，台湾经济嵌入大陆的演变过程体现出由快速进入向结构调整、功能重组和恢复延续并存的阶段性转变。

第二，从空间格局看，台湾经济嵌入大陆具有明显的省域分异。江苏、上海、福建、广东等东部沿海省域长期处于高嵌入水平，是台资企业集聚、产业协作和社会联系较为稳定的核心区域；中西部部分省域在产业转移、市场扩张和地方政策支持下逐渐成为新的承接空间；而西北、西南和东北部分地区嵌入水平仍相对较低。整体上，台湾经济嵌入大陆呈现由东部沿海向内陆节点扩散的梯度特征。

第三，从区域类型看，大陆省域可划分为全面协同区、持续深化区、新兴增长区和潜力拓展区。不同类型区域的差异不仅体现为嵌入水平高低，更体现为嵌入路径、产业功能和地方条件的不同。全面协同区应继续提升高端产业合作和制度创新水平，持续深化区应强化产业升级承接能力，新兴增长区应完善产业配套与营商环境，潜力拓展区则应立足资源禀赋和特色产业探索差异化合作路径。

第四，从嵌入结构看，三类嵌入具有不同作用机制。经贸嵌入体现台湾经济进入大陆地方市场的通道属性，生产嵌入反映台资企业与地方产业体系的组织耦合，社会嵌入则构成台湾经济长期扎根的重要关系基础。三者相互联系但并不同步，投资和贸易联系较强并不必然意味着深层产业根植，社会联系和制度互动也可能成为部分地区提升嵌入水平的重要支撑。

总体而言，台湾经济在大陆的嵌入已由早期的近岸进入和沿海集聚，逐步转向沿海深度根植与内陆节点扩散并存的新格局。省域尺度能够更清晰地揭示两岸经济融合的空间差异与地方机制。未来推进两岸经济融合，应避免单一化政策思路，依据不同省域的嵌入基础和发展阶段实施分类引导，推动两岸经济关系由要素流动型合作向产业协同型、社会根植型融合深化。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基于区域差异的充分考虑，提出如下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推动两岸经济更高水平的融合。

1. 巩固东部全面协同区的引领地位，迈向高端融合

对于福建、广东、江苏、上海等融合程度高的东南部省域，应继续发挥

其对台经贸合作的示范引领作用。这些地区产业配套完善、台资企业集聚，应进一步鼓励在高技术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等领域开展联合研发和投资，提升两岸产业合作的科技含量和价值链层次。同时，依托现有台商投资区、自贸区以及示范区等园区，率先探索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创新，实现从要素嵌入向制度嵌入延伸。在营商环境上，全面协同区应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服务供给，让台资企业安心扎根、加大投入，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的先行区。^①

2. 支持沿海持续深化区的产业升级，强化协同发展

浙江、天津等持续深化区具备良好的工业基础和开放水平，近年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关键期。这些地区可充分利用与邻近全面协同区的产业联系，积极承接其部分台资项目转移，同时发展自身的优势产业。政策上，可加大对新兴产业领域台资项目的引导，比如在数字经济、医疗健康、新能源汽车等领域设立两岸合作示范项目或产业园区，吸引台企投资布局。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协同提供必要的土地、人才、资金支持，促进台资与本地产业深度融合。通过区域协作，这些地区有望形成各具特色的台资产业集群，与全面协同区形成互补，进一步巩固沿海地区整体对台合作的深度和韧性。

3. 激发中西部新兴区的增长潜力，承接梯度转移

针对重庆、四川、河南等台资加速流入的中西部省份，政策应着力于夯实其吸引台资的基础条件，推动其成长为两岸融合的新增长极。首先，要加快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提升内陆省份的对外物流通道畅通程度，降低台商内陆投资的运输成本。加强航空直航和港口中转合作，使台资企业在内陆也能便利进出口。其次，深化“沿海带动内陆”战略，鼓励东部大型台资企业到中西部设立分支或合作生产基地，通过产业链延伸带动配套台资中小企业跟进布局。再次，地方政府应出台更具竞争力的招商引资政策，例如提供税费减免、用地优惠、融资支持等，重点引进符合当地产业方向的台湾龙头企业或高成长型中小企业。最后，要注重人力资源开发，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当地劳动力素质，以满足台资企业对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的需求。在政策和环境双重改善下，中西部地区有望持续承接台湾产业梯度

^① 李非等著：《两岸共同市场问题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26 年。

转移，实现两岸融合由点及面的扩散。

4. 拓展西部潜力区的合作领域，打造特色融合

面对贵州、云南、甘肃等目前融合程度较低但发展空间较大的省份，应采取差异化策略逐步提高其两岸经贸联系。一方面，充分发挥这些地区的资源禀赋和成本优势，鼓励台湾企业参与当地特色农业、生态旅游、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投资，形成“小而美”的合作示范项目。例如，支持台湾农企在西部开展茶叶种植加工、高山农业等合作，既带动当地产业升级又为台湾企业开辟新市场；另一方面，加强政策倾斜，在西部地区设立一批两岸经济融合试点，给予比照沿海的优惠政策，使台资企业敢于进入、留得下来。同时，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对台合作相结合，引导台商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贸易，通过更大范围的市场联动提升西部对台融合度。对于距离台湾较远导致交往不便的问题，可通过设立区域性台商服务中心、商会等方式加强沟通，提供“一站式”投资咨询和手续办理，降低台商进入门槛。长远看，随着西部整体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提高，两岸经济融合将在这些地区迎来新的增长点。

5. 探索两岸融合发展的机制建设，强化区域协同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探索新的经贸合作机制建设，^①降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壁垒，便利双向投资。建立健全台资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依法保障台胞在大陆投资兴业的合法权益，提升台商对大陆市场的信心。推动两岸金融领域合作创新，例如设立面向台资企业的专项信贷支持计划，鼓励更多台企在大陆上市融资，为产业融合提供金融支撑。与此同时，加强两岸民间交流和社会融合，通过扩大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合作项目，增进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与认同，为经济融合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特别是在当前两岸关系形势复杂的背景下，更应稳步开展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推动福建全域建设融合发展示范区，以点带面积累可复制经验，为未来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两岸融合发展奠定基础。中央层面可根据各地区融合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的对台经贸指导意见，避免“一刀切”政策。

^① 朱卫东：《全面贯彻“总体方略”扎实推进祖国统一》，《台海研究》2022年第4期，第2-7、14页。

可考虑建立由中央统筹、地方参与的两岸融合发展协调机制，定期评估各省融合进展，推广先进经验，帮助后进地区解决实际困难。在地方层面，各省市应发挥主动性，制定本地区两岸合作的中长期规划，明确自身在全国融合格局中的定位和目标。东部发达地区注重提升合作质量和层次，中部地区注重承东启西的枢纽作用，西部地区注重后发赶超与特色探索。通过区域间分工协作与良性竞争，形成东中西协同推进两岸融合的新局面。

Provincial Differences in Taiwan's Economic Embeddedness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Based on a Multidimensional Embeddedness Framework

Li Fei and Ren Zhihuang

Abstract: Cross-Straits economic integration is not a homogeneous process, but one of differentiated embedding and local anchoring across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Drawing on embeddedness theory, this study conceptualizes Taiwan's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as a multidimensional embedding process at the provincial scale. It develop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comprising trade, production, and social embedding, and applies the combination weighting approach to measure the level, structure, and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Taiwan's economic embedding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from 2004 to 2023. The results show that Taiwan's economic embedding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exhibits phased fluctuations, evolving through growth, adjustment, and recovery, which reflects the adaptive continuity of Cross-Straits economic linkages amid changing external conditions. Spatially, highly embedded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southeastern coastal areas, especially Jiangsu, Shanghai, Fujian, and Guangdong, with a gradient diffusion pattern from near-shore gateways and coastal industrial corridors toward inland nodes. Some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have also emerged as new receiving spaces, driven by industrial relocation, market expansion, and policy support. Structurally, trade embedding represents the

entry channel into local markets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production embedding reflects the organizational coupling between Taiwanese-funded enterprises and local industrial systems; and social embedding provides the relational foundation for long-term local operations. Regional classification further indicates that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s are shaped not only by investment scale, but also by industrial foundations, openness conditions, institutional provision, and social linkages. By revealing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local mechanisms of Taiwan's economic embedding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economic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and advancing Cross-Strait economic integration from a provincial perspective.

Keywords: Taiwan Economy; Multidimensional Embeddedness; Cross-Strait Integration; Provincial Differences; Combination Weighting Approach

(责任编辑：郭 琪)